

中国历史人物简论

(續集)

史苏苑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人物简史

(上册)

王明著

中国历史人物简史

中国历史人物简论

(續集)

史 苏 苑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郑州

中国历史人物簡論

(續集)

史苏苑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专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3075

787×1092 毫米 1/32 • 2 $\frac{9}{16}$ 印张 • 53,000 字

1963 年 8 月第 1 版 196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8,000 册

统一书号：11105·10

定价：(7) 0.26 元

前 言

1957年，曾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中国历史人物简论》，里面谈到了从秦始皇到明太祖等十名历史人物。几年以来，我又陆续写作整理了六篇，扼要地论述了由诸葛亮到史可法等六名历史人物。这六篇文章长短不等，详略各异。如诸葛亮，因为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社会影响十分普遍的人物，所以就谈得比较多一些，除了谈到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外，把他的坚贞的工作精神和廉洁的生活作风，也根据史实，作了一些阐述，着重从这些地方说明他在一千多年以来受到社会各阶层尊敬的原因。玄奘几乎是一个三尺童子皆知的人物。但一般人知道玄奘，很多是通过《西游记》上的“唐僧”的形象。究竟历史上的真正的玄奘是个什么样子？他具有怎样的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的大无畏精神？他在宗教和学术上有哪些成就？他在沟通中印文化方面有哪些贡献？从而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历史评价？等等，在这里都作了一定的说明。文天祥是一位正气浩然长存、光辉照耀史册的杀身成仁的典型爱国英雄，他的事迹是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气节道德教育的良好材料。所以在《丹心照耀史册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中着重写了这一方面。郑和，既是祖国的一位爱国航海家，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先驱。他的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惊人壮举，他接连在近三十年间七次远涉重洋是为了什么？每次都能胜利完成任务的主客观条件何在？他的多次远航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在《伟大的世界航海家先驱——郑和》中，都大致作了交代。努尔哈赤是

• 3 •

滿族的杰出民族英雄，对滿族的历史发展功績很大，應該給以足够的肯定，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也是文章的重点；但同时，他的活动，也危害了邻近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因而也提示了一下。至于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国家的性质，目前我国史学界还在討論中，意見还不一致。我认为奴隶制国家，并同意滿族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是在皇太极时代。史可法，是明末的一位爱国人物，他在清兵深入中原、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揚州抗清战役，从直接結果看，显然是失敗的，但影响却是深远的，正是从这时起，正式揭开了数十年武装抗清斗争的序幕。因此，他乃是南明一面光輝的抗清旗帜。他毫无愧色地当得起民族英雄的称号。最近史学界，由于评价康熙皇帝，曾引发了清朝入关初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的爭論，至今意見也未統一。我认为清初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至少在史可法揚州抗战时期是如此，否則当时包括汉族各阶层的风起云涌的抗清运动是不好理解的，史可法的伟大的思想转变也是不可思議的。不过我在論述史可法一文中，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作更多的發揮，因为这不是文章的重点。

汇集这个小册子，目的也和以前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簡論》一样，主要是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干部，大学专科历史系科的同学和中小学历史教师提供一点参考材料。

写作这几篇文章时，主观上力求論点明确，文字通俗。虽然也引用了一些古典文句，但一般并不艰深，而且有的地方还加了注释或說明。

因个人理論水平低，占有材料少，缺点錯誤定然难免，恳望讀者及时賜以指正！

史 苏 苑

1962年8月于郑州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	(1)
伟大的旅行家、翻譯家、佛学家玄奘.....	(17)
丹心照耀史册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25)
伟大的世界航海家先驅——郑和.....	(39)
南明一面光輝的抗清旗帜——史可法.....	(50)
滿族的兴起和努尔哈赤的历史地位.....	(61)

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

一 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

一千几百年来，諸葛亮一直被人們尊敬和歌頌着。多少世代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諸葛孔明神机妙算的故事。无数的詩人豪杰，一唱三叹地吟咏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滿襟”（杜甫：《蜀相》）的名句。这些事实，說明了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給予后代以深远的影响。

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汉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父亲諸葛珪，在东汉末年作过太山郡丞（郡丞是太守的助手）。叔父諸葛玄，作过袁术所署的豫章（江西南昌）太守，罢官以后，投靠荆州牧刘表。諸葛亮由于自幼父母双亡，无人撫养，在黄巾大起义社会动蕩的日子里，一直和叔父生活在一起。公元197年（汉献帝建安二



諸葛亮画像

年），諸葛玄死后，諸葛亮曾为生計所迫，一度在今湖北省襄陽以西的隆中地方参加过农业劳动。这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躬耕隴亩”。諸葛亮的这种“躬耕”和他日后在《前出师表》中所自称的“布衣”等，只不过說明他当时还是一个沒有官位的所謂平民。然而根据他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和文化教养等各方面而論，他还是一个有着一定代表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早年居住隆中期間，和庞德公、司馬徽、崔州平、石广元、徐庶、馬良等一些人，来往极为密切，大家經常在一块研討时局，評論人物，对当时的形势和发展前途，有着比較一致的看法。因而他們隱隱然就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他的《隆中对》，从某种程度上說也是这个集团的政治認識和时局主张的集中表現。

二 賢明的內政措施、正确的外交路綫

賢明的內政措施：諸葛亮虽然基本上是一个儒家学者，但是，在他处理內政問題的时候，却又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法家申（不害）韓（非）的学說。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又是一个汉代“王霸杂用”（即儒家和法家精神兼用）政治传统的优秀继承者。諸葛亮把法家学說具体运用于政治上时，就集中体现在信賞必罰的作风上面。以諸葛亮为首的賞罰严明的作风，对于保証蜀国政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諸葛亮的“王霸杂用”，善于治国一事，是当时魏蜀吳三个国家的政界中一致称道的。蜀国的呂凱說：“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三国志·蜀志》卷十三《呂凱传》）魏国的賈詡向曹操說：“諸葛亮善治国”（《三国志·魏志》卷十《賈詡传》）。吳国的大臣張溫曾經因为由蜀归国之

后，“称美蜀政”，而遭到孙权的“阴衔”（暗中怀恨）。因为事实是如此，所以就連自己的父亲受过諸葛亮的刑事处分（髡刑）的历史家陈寿，也不能不在他的《三国志·諸葛亮传》中盛贊諸葛亮是：“……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賞，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罰，服罪輸情者虽重必釋，游辭巧飾者虽輕必戮；善无微而不賞，恶无纖而不貶；……”因为諸葛亮具有这种“无恶不怨，无善不显”的严明作风，所以蜀国便“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风化肃然。”而对諸葛亮則是“終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严），而无怨者……”（《三国志·蜀志》卷五《諸葛亮传》）如蜀国的驃騎將軍李严和长水校尉廖立，两个人都是被諸葛亮免了官的。可是两人不但当时沒有怨言，甚至到后来听說諸葛亮逝世消息时，廖立还为之垂泣而叹，李严还为之发病身死。这些事例，都有力地証实了陈寿所說的“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話。东晋人习凿齿在他所著的《汉晋春秋》上也称贊諸葛亮是一个能够“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的秦汉以来所沒有的人物！

此外，諸葛亮还能知人善任，使具有各种不同才能的人，都各得其所地圍繞在自己的周围，而形成为一个比較坚固的领导集团。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諸葛亮曾在《前出师表》中向后主刘禅殷切地指明蜀国的一些高級官吏，如郭攸之、董允、张裔、向宠的才具。并叮嚀后主，当自己远征在外的时候，对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这些“志慮忠純”的官吏，應該“宮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这样就可以“裨补闕漏，有所广益”；对于“性行淑均，晓暢軍事”的向宠，應該“营中之事，悉以咨之”，这样就可以

使“行陣和睦，优劣得所”；对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贞良死节”之臣，应该“亲之信之”。诸葛亮对于这些人的长处都看得很清楚，估计得很正确，使用得很得当，基本上做到了人尽其才的地步。象蒋琬，能够在诸葛亮刚死之后的“远近危悚”的局面下，“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三国志·蜀志》卷十四《蒋琬传》）；象费祎，连孙权也认为是“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同上《费祎传》）；象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同上卷九《董允传》），使黄皓在董允活着的时候，官只做到黄门丞，且不敢“为非”。虽然蒋、费二人在诸葛亮死后相继执政的二十年的岁月里，只能保持诸葛亮所创立的规模，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毕竟还能够在“保国治民”的守成原则下，稳定了诸葛亮死后的蜀国政权。又象魏延和楊仪，各有突出特长和显著缺点，一个是“善养士卒，勇猛过人”而“性格高傲”（同上卷十《魏延传》）；一个是“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而“自恃其才，常有怨言”（同上《楊仪传》）。虽然他二人在诸葛亮部下互不相容，如同水火，但是，诸葛亮对于楊仪的才干和魏延的驍勇，却不忍偏废那一个，不是取此而舍彼，而是各用其长，使他俩都能在诸葛亮一代老老实实在地为蜀国服务。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能够不斤斤局限在资历上，破格从四川土著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出一批比较有才能的人来。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对于何祗的提拔。何祗原为楊洪門下的一个小职员，因为有才干，而当楊洪还是蜀郡太守的期间，何祗就又升为广汉太守。诸葛亮的这种作法，既能团结

一部分四川的知識分子，使他們“感恩图报”，忠心为蜀汉政权服务，收到了增强蜀汉政权和人尽其才的效果，所謂“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同上卷十一〈楊洪传〉）又可以把外来人和本地人的力量平衡一下，起一种緩和外来地主和土著地主矛盾的作用。后来到南宋时代，文天祥就对于諸葛亮这一点很肯定，他說：“諸葛亮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众思，广忠益。”（〈文山先生全集〉卷三〈己未上皇帝书〉）就是說，諸葛亮能够团结各方面的人才，集思广益，使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为蜀国服务。

諸葛亮在内政上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奖励农耕以提高农业生产；分兵屯田以減輕人民負担。实行这一措施，具有重大的作用，一度收到了“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饒”的效果（〈三国志·諸葛亮传〉注文）。这也是他受到蜀国人民爱戴的重要原因之一。蜀国的人民，由于爱戴諸葛亮，連帶地对于他的儿子也深怀好感。如諸葛亮死后，蜀国政府有些什么好的措施，百姓們总傳說着是諸葛亮的儿子諸葛瞻的所为。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諸葛亮的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他的所謂“和”与“撫”，也就是用政治軍事双管齐下（以政治为主，軍事为用）的办法，把蜀国西南地区的一部分“夷”族的地方領袖——“豪帅”、“大姓”的割据势力打击下去，使他們老老实实在地接受蜀国的领导，使这些地区成为蜀国一部分比較巩固的后方。这样，既可以使北伐时无后顾之忧，又可以利用当地的物資以充軍用。所謂“南土平定，……賦出叟濮，耕牛、战馬、金銀、犀革充继軍資，于时費用不

乏。”（《三国志·蜀志》卷十三《李恢传》）諸葛亮的这种“和”“撫”并用的策略，突出表現在对“夷”族首領孟获的“七擒七纵”，以爭取其心服一事上面。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僚來說，这种“和”“撫”并用的方式要算是一种对待少数民族的較好的方式了。尤其不容忽視的，是諸葛亮南征以后，在开发“夷”族地区方面的貢獻。他曾劝“夷”民筑城堡、务农桑，使“夷”民由山林迁到平原来，开拓了广闊的活动原野。由于南征的胜利，密切了汉“夷”人民的联系，也为帮助“夷”民提高生产技术創造了便利的条件。大量的历史記載和风俗傳說，都証明了由于諸葛亮对于“夷”族地区开发有重大的貢獻而博得了“夷”民的爱戴和紀念。如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給他立庙，当汉族人民“巷祭”的时候，“戎夷”就举行“野祀”。南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这样記述道：“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其髻以白紙縛之，云犹为諸葛武侯制服也。”明代人陆次云在他的《峒谿纘志》上記說：“苗祀神，多书孔明天子之位”。这些材料証明了諸葛亮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比較好的，从而也体现出了对于諸葛亮的历史定評和人民的公論。

正确的外交路綫：早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諸葛亮在隆中时，就对当前的形势向刘备作了三百余字的簡明而深刻的分析。他向刘备明确地指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与爭鋒；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賢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三国志·諸葛亮传》）基于这一根本的認識，他主张“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孙权，內修政理。”（同上）在这个时候，他即为蜀国制定了“联吳抗魏”的外交路綫。同

时也是他毕生遵循的政治行动纲领。以后的二十余年間，他一直为着这一路线的实现，而坚持不懈地奔走周旋。他不惜以蜀国最高謀臣的身分，冒险犯难，深入东吴。由于这一路线，既切合客观实际，又在人事上得到了吴国方面以政治家魯肃为首的一派官员的大力贊助，所以比較成功地实现了。这給蜀吴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现实利益。虽然关羽被吴杀后，刘备曾拒絕諸葛亮的劝告，在蜀吴之間发动了一场“复仇”大战，一度破坏了这一个联合，但等到刘备一死，諸葛亮就又主动而迅速地和吴国恢复了和好关系。他派邓芝向孙权剴切地說明了“蜀有重險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因此應該“合此二长，共为唇齿”的道理。这样及时地争取到了一度处在犹豫状态中的孙权，使他“遂自絕魏，与蜀連和”。从总的來說，蜀国的外交是一直遵循着諸葛亮隆中建議的主张而进行的。蜀国之所以能够以川貴一隅之地，和吴魏两个大国鼎立数十年之久，是和蜀国的这一外交路线分不开的。

三 軍事才能和北伐战争問題

就軍事方面而論，以最小的蜀国，能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內抗拒了最大的魏国，而且还几次主动出击，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在蜀国的人口土地只抵上魏国的九分之一，士兵不滿五万人的条件下，确是已尽到了主观上的最大努力。魏蜀之間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固然是属于魏国，但在长期战争的过程中，具体到一些战役上时，諸葛亮却表現出了非凡的軍事才能。他善于在一个战役展开之前，周密分析敌我优劣的形势和情况的变化。面对着錯綜复杂的事物，他知道在什么时

間，什么地方和什么条件下，要作什么工作，采取什么措施，应打击誰，联合誰，而自发地运用了辯証法以处理問題。正如恩格斯早已指出的：“人們远在知道辯証法是什么东西之前，已經按辯証法来作論断了，……”（《反杜林論》第一編《哲学·辯証法否定的否定》）郭沫若也說：“……馬克思列宁主义……闡发了客觀真理、历史发展的規律性而把它定式化了。古代历史人物的作风或多或少的符合于这个真理，便能收到相应的成就。”（《文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30頁）諸葛亮的善于根据客觀条件，作出具体分析，区别出每一时期的主要問題和次要問題以及它們之間的变化，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辯証法的真理。这就是說，尽管古代还没有明确系統的辯証法的理論，但这并不取消辯証法在人們头脑中不自覺地起作用的事实。諸葛亮的高人一筹之处，也就在于他能够在观察和处理錯綜复杂的問題时，善于随时分出先后主次及其发展变化，并巧妙地利用事情的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这在实际上就是不自覺地运用了辯証法。如在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赤壁之战中，就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一点。当曹操带着号称八十万大軍（实际上只有不到二十万人），浩浩蕩蕩到达大江边上，战云密布的严重时刻，諸葛亮冷靜地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清楚地看到了这时曹操野心勃勃，决心要一举而消灭孙刘，并吞江南。因此，这个时候，虽然存在着几种矛盾，但主要的則是曹操同孙权、刘备之間的矛盾。这是一个刻不容緩的必須及时解决的敌我生死存亡的主要矛盾。这时候，孙权和刘备之間的矛盾显然只是一个次要的矛盾。因为前一个矛盾規定和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时，諸葛亮明白地认定，

只有孙刘两方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抗击曹操战役的胜利。根据这种分析，他就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紧紧抓住事情中的有利于刘备的一面，即孙权既要确保江南的基本地盘，而又无力单独抵抗曹操的进攻，因而产生了不得不把希望暂时寄托在刘备身上的心理，迅速促成了孙刘两方的抗曹联盟。可是，这时要实现并巩固孙刘联盟，又需要首先扫除孙权集团内部的悲观失败情绪，加强孙权战胜曹操的信心。为此，他又以“舌战群儒”的方式，向以张昭为代表的孙权集团内部的投降派，开展了适当的斗争。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向孙权剴切地说明形势于己有利，而曹操方面却具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一、曹操之众，远来疲憊，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到达赤壁前綫时，已成了强弩之末；

二、曹军是北方之人，不习水战；

三、荆州之人是逼于兵威，不敢不暂时附和曹操，实际上他们并不心服，不会真正支持曹操。

諸葛亮认为这时曹操的强大是暂时的，表面的，而弱点是致命的，起决定作用的。諸葛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作了全面的分析之后，而把胜利的信心，建筑在“知己知彼”的科学性的分析基础之上，既不张慌失措，又不盲目乐观。事实果如諸葛亮的預見，赤壁一战，曹操被打得落花流水，造成了中国战史上的“……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10月第一版203頁）光辉事例，使曹操狼狈逃回中原。赤壁之战，消除了孙刘两方当前共同的危险敌人，成功地解决了当时的主要矛盾。然而随着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原来的次要矛盾，即孙

刘两方之間爭奪土地（南郡、襄陽、荊州）的矛盾，接着就一时又上升为主要矛盾。針對着这一矛盾的轉化，諸葛亮又协助刘备解决新升上来的主要矛盾。他估計了当时刘备方面的条件，还不能够也不应该和孙权破裂，进行大規模的軍事斗争，最好是采取既要联合又有斗争的办法。因此，他就既要和孙权集团中最排挤刘备而且有才干的周瑜相周旋，而又不放弃对孙权联合的基本方針。

此外，諸葛亮在軍事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善于治軍。他所訓練的軍隊，風紀严明，行动整齐，战斗力强。西晋人袁准曾說：“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芻蕘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之行軍，安靜而坚重。……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亮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营垒、井灶、圜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三国志·諸葛亮传》注文）可見諸葛亮部下士兵，風紀之严明和行动之整齐，在当时也是很出色的。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几次大規模的进攻中，屡次指揮蜀軍获得以少胜多的战果，是和这一点有着密切关系的。所以在他死后，他的老对手司馬懿看到他所布置的陣地时，也不禁慨然有“天下奇才”之叹。

諸葛亮在兵法上也有些創造。他除了对孙（武）吳（起）兵法，作进一步的发展外，为了战时节约人力，在交通工具和兵器方面，他还发明了木牛流馬（运输工具）和元戎（新式連弩）。晋人李兴曾称赞木牛流馬和元戎說：“木牛之奇，則亦般模（非前所規的意思），神弩之功，一何微妙。”